

早期中国研究丛书



秦始皇石刻

早期中国的文本与仪式

〔美〕柯马丁 著 刘倩 译 杨治宜 梅丽 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早期中国研究丛书



〔美〕柯马丁 著 刘倩 译 杨治宜 梅丽 校

秦始皇石刻

早期中国的文本与仪式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秦始皇石刻: 早期中国的文本与仪式 / (美)柯马丁著; 刘倩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4
(早期中国研究丛书)
ISBN 978-7-5325-7481-0

I. ①秦… II. ①柯… ②刘… III. ①秦始皇(前259~前210)—石刻—研究 IV. ①K877.40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66019号

早期中国研究丛书

秦始皇石刻: 早期中国的文本与仪式

[美]柯马丁 著

刘倩 译

杨治宜 梅丽 校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惠顿实业印刷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6.75 插页 2 字数 163,000

2015年4月第1版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100

ISBN 978-7-5325-7481-0

K · 1964 定价: 36.00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早期中国研究丛书编委会

总策划：朱渊清 陈 致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朱渊清	[美] 李 峰	[英] 汪 涛	[美] 张立东
陈 致	[日] 高木智见	唐际根	曹 峰

丛书序

“早期中国”是西方汉学(Sinology)研究长期形成的一个学术范畴,指汉代灭亡之前(公元 220 年)的中国研究,或是佛教传入之前的中国研究,此一时期的研究资料和研究方法都自成体系。以吉德炜(David Keightley)教授于 1975 年创办 *Early China* 杂志为标志,“早期中国”这个学术范畴基本确定。哥伦比亚大学近年设置的一个常年汉学讲座也以“早期中国”命名。

“早期中国”不仅是西方汉学研究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一种实用分类,而且是探求中国传统文化之源的重要的实质性概念。

从最初的聚落发展到广大地域内的统一的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秦帝国建立,并且在汉代走上农业文明之路、确立起帝国社会的价值观体系、完善科层选拔官僚制度及其考核标准,早期中国经历了从文明起源到文化初步成型的成长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可以说,早期中国不仅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也孕育、塑造了此后长期延续的传统中国文化的基本性格:编户齐民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长期稳定维系;商人的社会地位始终低下;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基本都被汉化,帝国疆域的扩张主要不是军事征服而是文化同化的结果;各种宗教基本不影响政治,世俗的伦理道德教化远胜超验的宗教情感;儒家思想主导的价

价值体系以及由此造就并共同作用的强大的官僚制度成为传统中国社会的决定性力量，等等。追源这类基本性格形成伊始的历史选择形态（动因与轨迹），对于重新审视与厘清中华文明的发生发展历程，乃至重新建构现代中国的价值观体系，无疑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早期中国研究不仅是西方汉学界的研究重心，长期以来，也是中国学术研究中取得巨大进展的重要方面。早期中国研究在中西学术交流的大背景下，形成了独特的研究风格和研究方法。这就是：扩充研究资料、丰富研究工具、创新研究技术，多学科协同不断探索新问题。

1916年，王国维以甲骨卜辞中所见殷代先公先王的名称、世系与《史记·殷本纪》所记殷代先公先王的名称、世系一一对照，发现《殷本纪》所记殷代先公先王之名，绝大部分出现在卜辞中。王国维把这种用“纸上材料”和“地下新材料”互证的研究方法称为“二重证据法”：“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

出土文献资料在现代的早期中国研究中显示出越益重要的作用。殷墟甲骨 100 年来约出土 15 万片，其中考古发掘出土的刻辞甲骨有 34 844 片。青铜器铭文，1937 年罗振玉编《三代吉金文存》，著录金文总数 4 831 件，其中绝大部分为传世器。《殷周金文集成》著录资料到 1988 年止，共著录了金文 11 983 件。此后到 2000 年，又有约 1 350 件铭文出土发表。最近二三十年，简帛文献资料如银雀山简、马王堆帛书、定州简、阜阳简、郭店简、上博简等都以包含大量古书而深受关注。

严格地说，王国维所说的地下材料，殷墟甲骨、商周金文都还

是文字资料,这些发现当时还不是考古发掘的结果,研究也不是从考古学的角度去研究。真正的考古学提供的是另外一种证据。傅斯年提倡“重建”古史,他主张结合文献考证与文物考证,扩充研究“材料”、革新研究“工具”。1928年,傅斯年创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立刻开始发掘殷墟。傅斯年在申请发掘殷墟的报告中说:“此次初步试探,指示吾人向何处工作,及地下所含无限知识,实不在文字也。”从1928年10月开始一直到1937年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殷墟共进行了15次发掘,发掘地点共11处,总面积46000余平方米,这15次发掘收获巨大:在小屯北地发掘了53座宫殿基址。在宫殿基址附近还发现了大量甲骨。在小屯村北约1公里处的武官村、侯家庄北地发现了商代王陵区,发掘了10座大墓及一千多座祭祀坑。在小屯村东南约1公里处的高楼庄后岗,发掘出了叠压的仰韶、龙山和殷三种文化层关系,解决了华北地区这三种古文化的相对年代。在后岗还发掘了殷代大墓。在殷墟其他地区,如大司空村等地还发掘了一批殷代墓葬。殷墟王陵的科学发掘举世震惊。中国考古学也从开创之初就确立了鲜明的为历史的特色和风格。为历史的中国考古学根植于这块土地上悠久传承的丰富文化和历史知识的积淀,强烈的活的民族情感和民族精神始终支撑着中国考古学家的工作。近50年来,中国考古学取得了无比巨大的成就,无论是新石器时代城址还是商周墓葬的发掘,都是早期中国文明具体直观的展示。

不同来源的资料相互检核,不同属性的资料相互印证,提供我们关于早期中国更加确切更加丰富的信息,能够不断地解决旧问题提出新问题,又因为不断提出的新问题而探寻无限更多的资料,而使我们对于早期中国的认识不断深入愈益全面。开放的多学科协同的综合研究使早期中国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对其他历史研究和学术研究来说,早期中国研究的这种研究风格和研究方法或

许也有其可资借鉴的意义。

王国维、傅斯年等人是近现代西方科学思想和知识的接受者、传播者，他们的古史研究是现代化的科学研究，他们开创了中国历史学和中国学术的新时代。现代中国学术的进步始终是与西方学术界新观念、新技术、新方法的传播紧密相连的。西方早期中国研究中一些重要的研究课题、重要的研究方法，比如文明起源研究、官僚制度研究、文本批评研究等等，启发带动着中国同行的研究。事实上，开放的现代学术研究也就是在不同文化知识背景学者的不断交流、对话中进步。我们举最近的一例。夏商周断代工程断代的一个重要基准点是确认周懿王元年为公元前 899 年，这是用现代天文学研究解释《竹书纪年》“天再旦于郑”天象资料的一项成果。这项成果的发明权归属韩国学者，在断代工程之前西方学界已确认了这个结论。将“天再旦”解释成日出前发生的一次日全食形成的现象的假说是中国学者刘朝阳在 1944 年提出的，他和随后的董作宾先生分别推算这是公元前 926 年 3 月 21 日或公元前 966 年 5 月 12 日的日食。1975 年韩国学者方善柱据此假说并参考 Oppolzer 的《日月食典》，首次论证“天再旦”记录的是公元前 899 年 4 月 21 日的日环食（《大陆杂志》51 卷第 1 期）。此后，1988 年美籍学者彭颀钧、邱锦程、周鸿翔不仅也认定“天再旦”所记是公元前 899 年的日环食，并对此次日食在“郑”（今陕西省华县， $\lambda = 109.8^{\circ}\text{E}$ ， $\varphi = 34.5^{\circ}\text{N}$ ）引起“天再旦”现象必须满足的天文条件，第一次做了详尽理论分析和计算，并假设日食甚至发生在日出之时，计算得出了表示地球自转变化的相应的 ΔT 为 $(5.8 \pm 0.15)\text{h}$ ，将“天再旦”的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夏商周断代工程再次确认了“天再旦”这一成果，并为此于 1997 年 3 月 9 日在新疆北部布网实地观测验证。

本丛书不仅是介绍西方学者一些具体的早期中国研究的成

果,引进一些新的概念、技术、思想、方法,而且更希望搭建一个开放性的不断探索前沿课题的学术交流对话的平台。这就算是我们寄望于“早期中国研究丛书”的又一个意义。

只有孤寂的求真之路才能通往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之境。值此焦躁不安的文化等待时刻,愿“早期中国研究丛书”能够坚定地走出自己的路。我们欢迎所有建立在丰富材料缜密分析基础上、富有独立思考探索成果的早期中国研究著作。

著述和出版是长久的事业,我们只要求自己尽力做得更好一些。希望大家来襄助。

朱渊清

2006/12/2

写于学无知室

目 录

图版、地图、表格目次	001
第一章 导论	001
第二章 翻译与注释	009
第一节 峰山石刻	009
第二节 泰山石刻	015
第三节 琅邪石刻	021
第四节 之罘石刻	030
第五节 之罘东观石刻	033
第六节 碣石门石刻	036
第七节 会稽石刻	039
第三章 秦始皇礼仪体系中的石刻	045
第一节 石刻的观念	045
第二节 前帝国时期秦宗庙青铜器、石磬铭文	053
第三节 巡狩与祭祀宇宙神灵	094

106	第四章 铭文的结构分析
106	第一节 作为文本系列的礼仪文本
113	第二节 各个主题结构
127	第三节 自我指涉现象
134	第四节 冗赘与限制的力量：仪式语言的表现形式
142	第五章 铭文的历史性阐释
142	第一节 在秦朝历史与汉代历史编撰之间
150	第二节 传统思想与礼仪实践的连续性
167	第三节 帝国初期的学术与威权
180	参考文献

图版、地图、表格目次

图版

图 1. 刻于公元 993 年的峰山石刻	014
图 2. 现存泰山石刻残片	020
图 3. 琅邪石刻残片	030
图 4. 中山石刻	050
图 5. 第一件秦公罇	062
图 6. 宋代手抄的第一件秦公罇铭文	063
图 7. 秦公簠	067
图 8. 秦公簠铭文(簠身)	067
图 9. 秦公簠铭文(簠盖)	068
图 10. 刻于秦公簠簠盖(左)、簠身(右)的其他铭文	068
图 11. 罇钟三件	071
图 12. 甬钟五件	071
图 13. 三件罇钟上的铭文	073
图 14. 两件甬钟其中之一的完整铭文,I	073
图 15. 两件甬钟其中之一的完整铭文,II	074
图 16. 石磬残片 85 凤南 M1 : 300(残片 1)	081
图 17. 石磬残片 85 凤南 M1 : 550+579(残片 10)	081

地图

地图 1. 公元前 714 年以来的秦国都城	053
地图 2. 秦始皇巡狩、祭祀之山	096

表格

表 1. 前帝国时期秦公青铜器铭文结构	089
表 2. 石刻的押韵格式	114
表 3. 石刻铭文开篇惯用主题的分布	118
表 4. 对皇帝的称谓及其分布	124
表 5. 石刻铭文原型文本拟议	126

第一章

导 论

据司马迁(前145年—约前85年)《史记·秦始皇本纪》,公元前219年到前210年间,秦始皇(前221年—前210年在位)在高级官员的陪同下,曾多次巡狩新近一统的帝国的东方各郡。^①秦始皇登上高山之巅,或临海高地,即令群臣“立石”“颂秦德”,^②并将颂词勒刻于石。这些铭文的撰、书,后世都系于左丞相李斯(前208年卒)名下。^③《史记》总共提及七次刻石,但至少有两处记载

① 巡狩路线,参阅鹤间和幸《秦帝國の形成と東方世界:始皇帝の東方巡狩経路の調査をふまえて》、稻叶一郎《秦始皇の巡狩と刻石》、王京阳《关于秦始皇几次出巡路线的探讨》。

② 这套勒石程式(有时略有变化),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六篇铭文之中三篇的绍述。《史记·秦始皇本纪》,页242、244、260;《史记·封禅书》,页1366—1367;《汉书·郊祀志上》,页1201。颂圣烈、刻于石这一行为本身,在铭文文本内部,又再次被自我指涉性地陈述出来。

③ 最早将铭文作者归于李斯的两位著名文人,一是刘勰(约467年—522年)《文心雕龙》(詹鍈《文心雕龙义证·封禅》,页803),一是酈道元(469年—527年)《水经注》(见王国维《水经注校·河水四》,页130;《水经注校·泗水》,页810;《水经注校·浙江水》,页1256)。张守节(725年—735年在世)认为,最后一篇铭文的文、书,皆李斯所为(见《史记·秦始皇本纪》,页261“正义”)。据《史记·秦始皇本纪》,页260;《史记·李斯列传》,页2547,李斯陪同秦始皇最后一次出巡东南。异于传统观点(自六朝以来逐渐形成),陈志良《泰山刻石考(下)》,页42—43认为,继任丞相的宦官赵高(前207年卒)更有可能是御用的书法家人选。

稍显混乱：谈到泰山^①时，言秦始皇“立石”，“封祀”；下山后，禅梁父，“刻所立石”^②——究竟是立石于梁父山，还是复返泰山之所立？不过，紧接着载录的石刻铭文第8行提到“兹泰山”，《史记》《汉书》的相关记载^③都明言立石于泰山，后世亦主此说^④。所以，梁父山大概并无石刻。《史记》的另一处记载，^⑤则将刻石之罘山^⑥之举定于公元前219年，但事实上，秦始皇公元前218年才巡狩至此，且在山上立刻石两块（其中一块刻于“东观”）^⑦，两篇铭文均有载于《史记》^⑧。故此，《史记》第一次提到的之罘山石刻，或许仅仅是文本错置，而非指较早的另一篇铭文。这一看法的隐含假定是今本《史记》篇章不完全可靠，其所录铭文的若干（尽管不太重要的）损坏与讹误，也是进一步证实这一假定的明显证据。此外，七篇石刻铭文，《史记》只保留了其中六篇。^⑨《史记》称为最早的峰山^⑩石刻，唐代亦为人所熟知，^⑪14世纪初以来则见于各种碑名录。^⑫

峰山石刻的文本历史，或许让人疑其真伪，但韵律方面存在的

① 今山东泰安北，参阅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页78。

② 《史记·秦始皇本纪》，页242。

③ 《史记·封禅书》，页1367；《汉书·郊祀志上》，页1201。

④ 容庚：《秦始皇刻石考》，页126—128。

⑤ 《史记·秦始皇本纪》，页244。

⑥ 今山东东北部的烟台，参阅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页78。

⑦ 《史记·秦始皇本纪》，页249。此处，“观”的实际意思不太明确，可能也指“台”“观台”。

⑧ 《史记·秦始皇本纪》，页249—250。

⑨ 《史记·秦始皇本纪》，页242—262。

⑩ 今山东南部的邹县，参阅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页78。

⑪ 对这些不同的、有时还相互矛盾的早期材料的深入讨论，见施蛰存《水经注碑录》，页267—274；袁维春《秦汉碑述》（包括碑铭注释），页42—49。后期文本历史的相关概述，请参阅容庚《秦始皇刻石考》，页130—131、164—167。

⑫ 据容庚《秦始皇刻石考》，页165，石刻铭文首见于吾衍（1272年—1311年）《周秦刻石释音》，页1308。各种碑名录中的版本，则录自公元993年以徐铉（916年—991年）所藏早期石刻拓片为摹本的翻刻。不过，似乎很明显，甚至连这一拓片也并非出自原碑，而是木、石的翻刻。相关讨论，参见前注提及的施蛰存、袁维春的文章。

某些证据却使得我们相信它实乃公元前3世纪末期的作品。^①石刻本身,像绝大多数的碑铭一样,很早便佚失于历史长河之中,^②公元993年的摹刻本,则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馆。司马迁所载石刻铭文的年表如下:公元前219年峯山、泰山、琅邪^③,公元前218年之罘、之罘东观,公元前215年碣石门^④,公元前211年(十二月)

① 详见下文。尽管整篇文本被认为是真实可靠的,但我还是想指出,文本的内部次序似为后人所颠倒。

② 容庚《秦始皇刻石考》,页126—131追索了石刻的历史。另见施蛰存《水经注碑录》,页267—274(峯山石刻)、289—294(琅邪石刻)、350—351(泰山石刻)、430—432(会稽石刻);袁维春《秦汉碑述》,页30—53。

③ 今山东东海岸胶南以南约30公里,见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页78。石刻很有可能立在秦始皇建造的著名的“琅邪台”上;《史记·秦始皇本纪》,页244记载说:“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十二岁。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其辞)曰……”这段记载,存在很多文本问题,见王叔岷《史记斟证·秦始皇本纪》,页208—209;泷川龟太郎《史记会注考证·秦始皇本纪》,页35—36。同样,这里是否谈及了两个不同的“台”,尚不清楚,最早的那个“台”或许可以远溯到公元前5世纪,参见对此段记载的传统评注。

④ 在流传下来的文献中(战国以来),有关碣石的资料稀少且相互齟齬,引发了诸多有关其性质及地理位置的争论。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页9—10认为,秦时碣石,即今碣石山,在今河北昌黎之北。但近年来的考古学界认为,碣石实际上是一个地名,指的是今辽宁绥中县昌黎东北约140公里的沿海之滨,1982年以来,此处曾发掘出大型秦宫遗址。尽管迄今为止的这些考古发现(包括砖、瓦),尚无文字证据表明此地的秦代名称,但其实际地理位置与传统文献很多方面的记载相一致,见王玉冰《试论秦始皇东巡的“碣石”与“碣石宫”》(也包括对早期考古鉴定的简要概述)。考古地点与遗址的全面描述,以及更多的参考资料,见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姜女石工作站编辑的三部著作:《辽宁绥中县“姜女石”秦汉建筑群址石碑地遗址的勘探与试掘》《辽宁绥中县石碑地秦汉宫城遗址1993—1995年发掘简报》《辽宁绥中县“姜女石”秦汉建筑群址瓦子地遗址一号窑址》,以及杨荣昌《石碑地遗址出土秦汉建筑瓦件比较研究》。如果找不到东北地区除此之外的任何主要的秦朝宫殿与祭祀建筑的话,我们姑且接受绥中即碣石的观点。不过,既然《史记·秦始皇本纪》,页252记载说,始皇帝在刻石碣石之后继续北巡帝国边境,那么碣石的地理位置就无需北至今日之绥中。这需要新的考古证据才能得出确切结论。即便碣石位于今之绥中,故而也并非是真山真岳,那么,我们应当认为,秦始皇大约是就此地的性质及宇宙意义而言,将绥中视为似山之高地。首先,作为帝国立石的处所,碣石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一系列地点里的一环,其他的立石之所全都是真山真岳。其次,碣石是作为近海的山名或山脉名而出现的,其所滨海域在文化英雄禹——始皇帝理想统治的首要典范之一——的神话地理学中占据显著位置(详见下)。所以,提及秦石刻时,我仍将刻石之处指涉为山巅,尽管严格说来,碣石可能并不是山岳之名。

或公元前 210 年(一月)会稽^①。据我所知,唯一对这一石刻顺序提出疑异的是陈志良^②,近年来鹤间和幸亦赞成、申论此说^③。陈志良认为,泰山石刻并非始皇帝所立,而是其子秦二世(前 210 年—前 207 年在位)所立。公元前 209 年,秦二世巡游其父立石之处,在石碑侧面进行补充刻录,尤其是始皇帝最初巡游时从臣的名录。根据陈志良的观点,公元前 219 年始皇帝封禅时所立之石,并不是石刻,而是没有铭文的“社石”。按照这种解释,陈志良相当具有推测性的结论部分解答了前文提及的文本问题。但是,由于《秦始皇本纪》存在别的几处文本错置(详见下),我们同样也可以认为,这里所见的文本并非其最佳形态。陈志良并没有解决前文所引的“刻所立石”这句话中明显存在的问题,此句似以始皇帝为主语,且刻的是此前所立之石。如果司马迁的本意的确同于陈志良从现有文本所获得的解释——也就是说这段文字完好无缺,那其措辞又何以如此含混呢?

鹤间和幸进而认为峰山石刻也是秦二世公元前 209 年巡狩时所立;在申论陈志良观点的基础之上,他进一步考察了峰山、泰山石刻铭文的整体结构,并认为某些特别词汇是秦始皇自己绝不会使用的。鹤间和幸仍把余下的五篇铭文归于始皇帝名下,石刻顺序保持不变,琅邪石刻位列石刻之首。我对这一结论有所保留,陈志良、鹤间和幸提出的问题,其实可以通过别的途径得到解决。鉴于帝国初期材料的相对缺乏,现存《史记》文本又始终存在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因此想要“摆平”各种矛盾之处,进行清楚顺畅的解读,需要真凭实据,而这正是这两篇铭文所缺乏的。尽管如此,本

① 今浙江绍兴南,见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页 11—12。

② 见陈志良《泰山刻石考》。

③ 见鹤间和幸《秦始皇帝の東方巡狩刻石に見る虚構性》。